

新思潮

RIVE GAUCHE

19

5.1.78

0.50

時事評論 文學 電影



紡織製衣工人 面對的危機

被稱為「條件極之苛刻」、「完全不能接受」的香港棉織品輸往歐洲共同市場雙邊協定，最後終於在十二月三日簽署。這個新協定為期五年，由明年至八一年止。規定明年由港輸共市的紡織品總限額要比一九六六年減少百分之九（十五萬三千噸，少一萬三千噸），以後每年增加百分之六。而其中幾類敏感性製品，特別地受到大幅度削減配額的限額——布疋減百分之三十二，褲類、梭織恤衫、針織棉內衣各削減百分之十五。

在同一天，一間位於葵涌青山道的藝美織造廠的一百四十多名工人，因不滿資方於上月底藉口「生產不佳」，實行隔日開工、削減加班薪金、取消勤工獎和車馬費等，而實行停工。

這件「巧合」的事，却正是對紡織染和製衣工人的一項預告，反映出在「生產退縮」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陰影下，他們將會遇到的就業打擊。

批判 現代的戀愛觀



關於 以色列的神話

評 高中及專上 教育綠皮書

金禧中學事件



涉及數十萬中學生和數萬名私立大專學生命運，備各教育團體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所關心的「高中及專上教育——未來十年內香港在高中及專上教育方面發展計劃」綠皮書，終於在十一月面世了。綠皮書所提出的政策多措施，已經受到不少社團、教育團體或學生組織的反對，尤其有關私立專上學院的政策，浸會學生會曾就這問題召開了研討會，並總結了與會者的意見，指出港英歧視私立專上學院和學生。對綠皮書對大專方面所提出的政策，相信將會引起更多人仕的關心和反對。

本文將就有關初中和高中教育的部份，作出分析和批評。在此之前，有一事需要先指出的，就是港英政府一貫以「尊重民意」自稱；例如：在綠皮書的諸言部份，便有如下的字樣：「綠皮書內建議只屬諮詢，作為定出決策前廣徵各界意見張本。」請回顧近年來，社會上廣大的市民和團體紛紛提出反對小學智能測驗，反對腰斬中學，提出了十一年資助教育及其它有關教育問題的意見，港英政府有聽見嗎？有採納和修改嗎？小學智能測驗已於十二中首次舉行了；十萬四千個幼小心靈不是已被磨折了嗎？以後不知還有多小被害呢！綠皮書內隻字不提十一年資助教育；腰斬中學的中三淘汰試仍保留在綠皮書內。這表示了甚麼呢？不是港英的虛偽和獨斷獨行，還是甚麼呢！

綠皮書毫無諱言地說明了港英政府中的字教育的政策。在「主要目標及建議」一節裏，便這樣寫道：「政府在未來十年之首要教育目標，是使學生念完中三後有更大機會接受津貼之高中及工業學院教育」。清楚地指出不是所有中三學生都有機會升上中四。因此，中三淘汰試勢在必行。為了掩色其醜惡的目的，綠皮書接着擺出一副關心學生利益的臉孔，繼續說道：「政府之目的是為所有希望升學之中三學生，提供升讀資助高中及工業學院等之機會。」看！好像在說中三淘汰試不是政府的主觀目的，而是學生自己不長進，不願繼續讀高中似的。為了進一步證明是學生自己不願升讀，綠皮書提出下面的荒謬理由：「事實上，並非所有學生都有意繼續學生，而且亦毋須由中學提供全部學位。」「況且，由於遲入學或留級之故，為數不少學生升到中三時已是十六七歲，因此可能無意繼續留在學校讀下去。需知道，很多人在讀完中三便決定離校，並不是單純因為學費及其他雜費問題。更重要的因素是全日入學等於失去了賺錢機會。」「現在中一至中三課程的設計是以迎合學習能力不一之兒童的需要。」「而中四及中五的課程則以應付中學會考為目標。有可能完成學業而在中學會考合格的，



絕大多數是能力較高的前四成學生。動機固然亦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要勉強能力不逮的學生為應付考試而學習實在並非為學生的利益着想。」

關於學生讀完中三後離校，首先我們要問，過往讀完中三退學的人數有多少？為甚麼綠皮書不將詳細資料列舉出來？同時，綠皮書指出學生不願失去賺錢機會而離校，究竟有沒有深入研究其中原因，以「並不是單純因為學費及其他雜費問題」而退學，這個理由太空洞了。是的，正不是單純這個原因，真正的原因却多得呢！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佔香港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來自勞苦大眾的家庭，他們的父母日夜辛勤地勞動，但由於港英沒有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資，任由由資本家壓低工資，又沒有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港英又不斷地大施搜刮，帶頭加租、加價及加稅，又從容公共事業加價，不斷地製造通貨膨脹，實際上方能使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學生的家雖然更辛苦地工作，仍不足以維持家庭的開支，莫說學費和雜費交不起，而且需要子女停學出來工作才能維持家計，試問學生如何能繼續升學。退一步說，有些學生不是為了維持家計而停學，責任亦不能完全推在學生身上；社會上流行的享樂主義意識和各種各樣的宣傳媒介，不斷地鼓吹着一些醜惡和錯誤的思想，加上如綠皮書本身所提出的「讀完中五的未卜前程」等等因素是不能推卸其責任的。政府不去正視其本身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畸型現象加以補救，却還藉此替其政策辯護。

綠皮書要實行中三試的第二個理由，是學生智能力有不逮，真的百分之五十的學生都是蠢材嗎？在討論這個理由之前，不妨指出綠皮書本身的前後矛盾，港英說「政府之目的是為所有希望升學之中學生，提

供升讀資助高中……。」為甚麼接着又說「動機固然亦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要勉強能力不逮的學生為應付考試而學習實在並非為學生的利益着想。」這不是說就是學生希望也不能由自己決定嗎？為甚麼還是假惺惺地說為所有希望升學學生提供資助，這不是自掌嘴巴嗎？

究竟大部份是蠢材還是教育制度不合理，而造成學生未能全面發展智能呢？這個問題，每一個有責任感的老師及在學的學生，他們最清楚地知道，學生退學的最主要因素，並不是學生愚蠢，而是由於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所造出來的惡果。事實上，綠皮書所持的藉口「中四及中五的課程則以應付中學會考為目標。」便最明白地暴露了殖民地政府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性。要知道，教育的任務是灌輸知識，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提高學生的文化水平，發揮德智體群。而不是以一種不合理的考試制度而卡壓學生。一貫以來，政府施行奴化政策，只顧如何使學生和市民馴服於其殖民統治。施行精英教育政策，迫使學生疲於為考試而死讀書，讀死書。再者，由於適應這個不合的制度，老師們即使有心作能英材，也無奈為這種那種的考試緊壓着，迫得不教死書，只求學生背誦考試課程，而無法展抱負。其次，在課程方面，教育司獨裁地製訂，根本上毫不考慮課程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等因素。都是另學生感覺到在校讀書是一種枯燥無味的事。加上不斷的測驗，考試和大量的功課等，大都是窒息學生智能的因素。綠皮書以竟成的惡果為理由，作進一步卡壓學生的根據，可見殖民政府基本政策不變。從上述的分析，使我們深刻地知道，港英企圖將本身不合理的制度所造出來的惡果，加以合理化來掩色殖民地主義的本質。

中三淘汰試如一經實行，每年十萬的中三學生將會受到更大的損害。其害處之深遠，不僅在學校時增加精神壓力，說爭劇烈。而且會進一步壓抑學生智能發展，每一個學生將會由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便受着考試折磨，十一、二歲開始，便成為一部考試機器，對於剛開始發育和智能發展的少年來說，將受到窒息而令他們修身受害。

另一個害處，半數十五年歲受淘汰的少年失去求學的機會，這無疑像對這半數青少年宣判了終身前途。作為資本家的廉價勞工。

雖然綠皮書以工業訓練學校，少年警察學校及成人教育等等措施來喧染被淘汰的半數學生仍然有良好的機會，但還是掩蓋不了中三淘汰試所引起的惡劣後果。因此反對中三淘汰試是急不容緩的。

八十萬屋邨居民（猶其是乙類屋邨居民）浪費公幣呢？但，事實上甲類屋邨租金除支出外，尚有百分之廿五盈餘，而乙類屋邨，身為房屋委員會委員的葉錫恩，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舊型屋邨的租金實在可以包括一切開支且有盈餘。那麼，赤字又從何而來呢？

真正罪魁禍首不得不歸咎於香港政府的公營房屋政策。公營房屋是針對入息低，付不起私人樓宇昂貴租值的家庭，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實應是當政者對貧苦市民的一項社會福利服務。但，香港政府却倒行逆施，七三年開始屋委會財政獨立，自負盈虧，老子一於少理，興建公屋也是由屋委員負擔，實質上是居民建屋，政府「執福」，不但回一筆建屋費，而且反得到一筆進賬。因為除了借款、地價要價還外；利息和差餉是直接流入政府庫內。

在租金總收入中，除了上文提及過的巨額利息支出外，差餉的支出也是不遑多讓，差餉年年倍增，甲類屋邨由七三年的百分之九增至百分之卅三（以私人樓宇百分之十八的徵收率為要），而乙類屋邨則由無變有，七五年佔租金收入百分之十二點六，根據香港政府一貫實行高地價、高租值政策，地價必然遞增，差餉也隨着增加，屋邨居民的負擔也必隨着越加深重。雖然報告書聲言，今年度差餉不會直接轉嫁到居民身上，但下一年度又如何呢，報告書却閃爍其詞，祇是說將會進一步討論。

新財政調整雖然豁免了地價和利息，但，還有差餉。二年一次檢討租值是肯定下來，檢討標準祇是在於經常費用、成本的增加和擴大盈餘，而沒有考慮到一般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報告書對釐訂租金價值雖然十分含糊（一方面是根據屋邨設備、環境的優劣，一方面是與其他屋邨比較），但，住靚屋、交貴租的租金政策却一點也不含糊。（第三版續）

揭開新公共屋宇租金政策的畫皮

作為擁有一百八十多萬住戶，本港最大業主的房屋委員會，在今年十月發表了一份租金政策報告書，闡述最新的財政安排，解釋公屋租金釐訂的標準和未來租金徵收的取向。房屋委員會的租金政策動輒影響全港百分之四十五居民的生活，所以，不但屋邨居民，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也應該加以關注。

在報告書中，政府與房屋委員會作出協定，提出新的財政安排，內容為(1)房屋委會過去向政府的借款，悉數轉入政府對公共的支出項目中。(2)政府的貸款分四十年清還。(3)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後的建屋費用，政府免息貸款。(4)政府取消每年支付給乙類屋邨赤字的資助。對於最受屋邨居民關注的加租與否問題，房屋委員會今次大大送了個人情。由於上述新財政安排的影響，七三年以後落成的屋邨，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租金維持不變；直至有此需要為止，乙類屋邨雖不受新財政安排的影響，但由於七六年已加了租，根據兩年一次調整租值的政策，現時還未及加租時間，所以，大部份的屋邨這兩年內均不會加租。而七六一七七年度增加的差餉數額，也由政府撥出特別的資助（例如對乙類屋邨）或由房屋署代為負擔，得以免於轉嫁於居民身上。

聽到暫時得免加租，居民不禁要鬆一口氣，驟眼看來，在新財政安排的首四點，應該是有利於居民。因為公屋的租金，主要包括三大項。(1)差餉徵收、(2)保養費、(3)財政開支、包括分四十年攤還地價和建築費，另加百分之三點五的利息。而根據資料顯示，過去租金收入中，單是利息一項，佔甲類屋邨租金百分之廿三，乙類屋邨則為百分之十二·六，合計六千七百多萬，約佔租金總收入五份之一。現在豁免了地價和建築費的利息，租金應該會減輕吧！

但，若細心研究一大報告書內容，却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報告書指出新的財政安排，對於歷史性結構的屋邨（包括乙類屋邨、廉租屋和舊公共屋邨）並無影響，最受實惠的祇是七三年以後興建的屋邨。因為這些以貴租著名的屋邨，租金高昂的原因是由於地價貴和成本高。但，這並不意味着租金會因地價、建屋費利息的豁免而減低，因為那些多出來的錢，並

不是用於交租的居民身上，祇是房屋署用來興建新屋邨的費用而已。

其中最值得留意的，就是政府取消對乙類屋邨赤字的資助，換言之，屋委會以後需自行填補每年支出的赤字，以屋委會一貫做法，實質是要居民自行填補，隱隱然，我們嗅到了加租的氣味了！

因為，由於政府近年狂增差餉，使乙類屋邨每年都出現近五仟萬的赤字。根據報告書指出，乙類屋邨的差餉，自一九七四年開始徵收以來，是作為政府填補赤字的資助的一部份，而沒有轉嫁於居民身上；而現時居民所交每方呎二毫八的租金，祇夠繳交差餉和經常費用百分之四十五，還不包括財政收費在內。單是七三—七四年，政府便要撥出五仟多萬的資助，現在一旦取消資助；政府將遭大包袱順理成章地放回居民的背上。

新公屋租金政策的公佈，究竟對誰人有利呢？在居民方面，祇有眼前租金維持不變的許諾，但能維持多久尚屬一個疑問。因為房屋委員會有「兩年檢討一次租金租值」的法案，加不加租，權在於官老爺。在政府方面，新政策却是進一步推卸對承擔公共房屋作為社會福利的責任。除了上述明顯地取消乙類屋邨的資助外，更可以從新、舊財政調整的轉變中，看到政府推卸責任的端倪。

報告書指出，屋委會一直以來都是欠債累累，以借貸渡日。自一九七三年屋委員成立以來，首先便需接手過去欠下發展貸款基金的借款，和承擔了乙類屋邨的財政責任。加上屋委會是財政獨立，必須自掏腰包興建新屋邨。年年激增的地價和建屋費用使成本大增，不但，欠下工務局一筆款子。屋委會正是舊債未清，新債又來，如雪地滾球，越滾越大，不得不向政府借款來償還積欠款項的利息。

情況是十分明顯，屋委會的債務是還不勝還，僅要向最大債權人借錢還款，官老爺們心中算算，繼續下去不是路數，所以才有新財政調整的協定實行。政府去無用之財（永遠還不完），却一勞永逸地卸下乙類屋邨的大包袱。算來算去還是划得來呀？

如果要問為甚麼屋委會為何欠債累累？是否一百

新思潮月刊·第十九期·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新思潮編委會出版·凡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委會立場·定價每份五角·訂閱一年五元·所有通訊可寄：香港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電話3-658857

(接第八版)

- * 五十年代支持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和近百萬阿爾及利亞人的大屠殺；
- * 五一年支持美帝入侵韓國；
- * 五六年聯同英、法入侵埃及；
- * 五八年支持美帝國入侵黎巴嫩；
- * 支持美帝入侵越南。

這都是以以色列種族主義制度的邏輯結果。因為以色列要長期地把阿拉伯人貶為二等公民，就必然要加強鎮壓，也就必需要依賴帝國主義的支持，成為其中東的代理人。以色列每年得美援近一兆，它還最少有十三個核彈頭，不單能攻擊阿拉伯鄰國，其射程還遠及蘇聯在歐洲南部的城市。中東之成為世界的火藥庫，不但是對阿拉伯人民的威脅，也是猶太人的悲劇。無論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也不能容許這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制度有存在的權利，而應該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

- ①國際社會主義者評論，一九七一年一月。
- ②洲際通訊第十三卷十二號，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③洲際通訊第十三卷二十六號，七五年七月七日。
- ④洲際通訊第十五卷三十八號，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 ⑤「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每日評論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附註一：薩克教授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有機化學系的教授，他原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在德國納粹囚禁集中營，四年移民巴勒斯坦，六七年六月戰爭的事變使他放棄了立場。他在以色列進行反歧視非猶太人的活動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國會曾對他的問題進行辯論，有人建議把他驅逐出境，取消公民權，但大概這樣對待一位猶太人會令以色列政府過於尷尬，所以沒有付諸實行②。

附註二：防衛條件原是英殖民政府在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鎮壓巴勒斯坦人起義時訂下的。其中如第一四二條規定：「任何人企圖，以講話或其他方式，影響公眾意見，其態度似乎是對公共安全，防衛或維持公共秩序存有偏見的」，會被認為是犯罪。第一〇九條中規定可以基於某人與其他人的交往和聯絡，和某人有新聞和宣傳意見的活動」，而限制其行動。

(接第2版)

所以，新財政調整，實質上並沒有對居民近年來的反貴租的要求作出實質的讓步。報告書一出，房屋署長黎保德便已與高彩烈地安排加緊建屋大計，不但是一般的公共房屋，還包括「居者有其屋」的售樓大計啦！

由報告書着手草議以至完成，最直接受影響的屋邨居民竟完全排斥於外，祇是由屋委屬下的一個小組負責。葉錫恩指責此報告書是閉門造車，違反居民意見，更大爆租金政策小組的內爆。她指出報告書未出籠之時，她共參加了十四次租值政策會議，但每次會議祇得小貓一兩隻，根本無所謂對報告書作出討論，而且亦無權決定，她更指出，該小組主席會聲稱，釐訂公共屋邨租金，應以私人樓宇租值的一半為準則，不管任何人提出抗議，亦無注改變……這決定雖有其中三位委員反對，但該報告書最後仍以此為定案，由此可見，香港政府為了推卸其承擔公共房屋作為社會福利的責任，是不肯聽取反對意見的，強詞奪理不成時，就索性拋開「聽取民意」的假面；對影響達一百八十多萬居民的租金政策，連綠皮書也不出版，讓房屋可施格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就算交待了事。

新租金政策報告員面世後，立即引起反響，由廿多人屋邨居民組織和熱心社團所組成的「公共房屋租金政策行動委員會」於十一月十三日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提出四點要求：(一)重新組織一個由熟識房屋政策和對屋邨實際情況有認識人仕為首的委員會來制訂公共屋邨的租金政策，而委員會應包括現時公屋的居民代表在內，(二)制訂租金建議書應以綠皮書方式，讓社會人士及有關居民提供意見和討論，(三)對公共屋邨的租金及差餉不能以私人樓宇作比較，公共房屋實為一項社會服務，(四)新租金政策對免息貸款及免費土地用途及處理方法，並沒有詳細解釋。

從以上要求看來，政府獨斷獨行的不民主作風，已為市民大眾所給病了。越來越多居民明白到，祇有代表他們的居民代表參與，才會制訂合乎居民利益的租金政策來！

陳若子

每年的上半年，為數一萬八千人的預科生便開始進入緊張階段，以應付在年中舉行的兩間大學的入學試。大學學位的缺乏已是一個不用爭議的事實，就以中文大學為例，每年應考生不下九千人；競爭一千個學位。每一個考生必需經歷過一場以一敵十的嘶殺，才能夠踐踏着失敗者的殘骸走進高等學府的窄門。雖然，還有三間教育學院和近年大張旗鼓的理工學院可供選擇，但在官、津小教師職業保障汲汲可危，三師同學憂慮多時的出路問題懸而未決的今日，對一些志不在理工科的同業而言，兩間大學仍是他們尋求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而一些由私人機構設立的大專院校，也在大學學位僧多粥小，高等教育需求殷切的情況下應運而生，提供預科畢業生多一條出路。

目前，香港正式註冊的私立大專有兩間：浸會和樹仁；合共提供了四千五百個就讀機會。均為全日制，四年完成的文憑課程。學科方面以浸會為例，分理學院、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廣泛性可直追兩所大學。但，這些私立大專均有二個共通性：(一)學費高昂，由於政府對這些院校不作任何資助，學院一切開支主要靠學費維持。(二)地位備受歧視，香港政府身先士卒，在政府機構工作的私立大專畢業生的起薪點，低於兩所大學，而一般私人機構，除了兩所大學未及設立或在草階段的專業學科外，私立大專畢業生的薪酬往往是矮了一截。私立大專的同學付出高昂的學費，以同樣的精力和時間，但，無論在師資，教學設備，學舍，以至畢業後的出路、薪酬各方面均遠不如人。而一些還未獲承認的大專(如珠海、嶺南等)，其情況更比浸會、樹仁為差。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香港政府不但不加以改善，在最近發表的「高等及專上教育綠皮書」中，更進一步肯定了過去的政策。

首先，綠皮書不得不承認私立大專有其存在的客



觀條件。它說：「除非大專及理工學院能加以擴充，使學額比現時計劃中的為多，否則學生仍將繼續進入專上學院就讀」。這個結論是不講自明的；因為，兩所大學每年提供大學一年級學位祇有二千一百個，佔全港適齡青年祇有百分之一·九，相對起每年一萬八千多的預科畢業生，亦祇能佔百分之十一·七而已。即使包括理工，護士學校和教育學院，這些由政府提供或全數資助為學院，亦不過提供了一萬五千八百個就讀機會。顯然，現時的學位，是遠遠達不到學生的需求，但綠皮書却大不理會高中生的願望，確認：「政府不擬改變這些學院的私立地位，亦沒有使其得以維持下去而作任何承擔。」對於有三千多學生的私立浸會書院，政府最大資助祇是「向浸會學院學生提供免息貸款計劃」，對有八百多學生的樹仁更不會……對該學院或其學生以貸款方式提供任何經濟援助。」而且，綠皮書還實際上將兩所私立大專的地位，降低到介乎於中學六年級高級程度與大學學位之間，在以前，浸會樹仁的同學雖然一直受輕視，但還算可與理工學院的水平同等，但現在就是確定了它們的次等公民地位，政府態度則是不聞不問，無意改善。

政府所提出「歧視有理」的論據是：第一就是在未來十年中，大學學位將會增加，原因是政府「設法擴展兩所大學」，和「十七歲及十九歲之人口將會減少」。第二是指出私立大專均屬人文學科及非其他技術性科目，不能與提供職業資格課程的理工可比，所以「現有政府資助的學校比專上學院更能滿足學生之需求」。

現在，讓我們去看看政府擴展大學鴻圖大計罷！在四年後(八一年)，兩所大專提供第一年的學位由現有的二千一百增至二千七百，十年後(八六年)不

過是增至三千一百人而已。理工學院，由於目前正符合資本家「工業多元化」的計劃，其增長則將較快，會由現時全校一萬二千增至一萬五千九百人。到時全港受承認的專上學生總數亦不會超過二萬人。但現時私立大專(包括註冊與未註冊)，所提供第一年的學位需無正式統計，但根據七六年的資料顯示，全港私立大專共有學生三萬人，浸會一校就已與中文大學差不多了。由此可見，如果政府立時資助各私立大專，以提高師資和設備，並承認其大學學位資格，那末，大學學位的數目便立時倍增，不期之以十年了。

對於指稱私立大專學科純粹為人文科學，浸會學院校長謝志偉已在一次座談會中，公開指斥政府所言不符事實，即如上文所說浸會學院是包括理工科及專業訓練。但即使政府所言屬實，却完全不足以作為蔑視私立大專的口實，因為學生亦有機會去選課，作為專材訓練的專上教育，理應廣設學科，以供不同志趣的學生選擇。但，政府近年來大事擴展理工學院和興建工業中學，而兩間大學學位這兩年竟無增加，這次更以偏重人文科作為口實，拒絕資助私立大專，可見政府教育政策，祇是配合工業發展的趨勢，和適應工商界日益高漲對高級技術和管理人員的需求。綠皮書說專上學院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正確應該是不能滿足大廠主，大商家的需求罷了。

私立大專的產生，是由於大學學位不足所致，而師資、出路均不如政府資助的大學，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專能存在至今，可反映出青年人對高等教育渴求的殷切。如果同學驚怪於政府何以不厭其煩地把高等教育分等分級，人為地製造差別；或者對政府何以捨近求遠，拒絕以現有私立大專的基礎來擴充大學學位，那麼，我們祇要把私立大專問題連繫到整個教育政策來看，便會昭然若揭了。

香港教育政策的設計，是以一個金字塔形式向上發展，在金字塔頂端的專上教育，只為一小撮人所享有。而在這一小撮中又劃分等級，中大不如港大，理工不如中大，註冊私立大專又不如理工，等等……，一層一層劃分，界限森嚴。而在中學教育方面，搬出一套中三淘汰試將中學教育腰斬，剝奪了百分之四十的初中生升學機會。對小學生又以一次學能測驗來評定優劣，送入不同的中學就讀。可見，政府的等級政策，不論在大、中、小學皆是一貫的。

教育上劃分等級實質是將人劃分為若干不同的社會等級。綠皮書徵引一九七六年「副人口調查申報資料」，發現全港工人中，僅有百分之三的工人受聘為技能水準相等於技師級的工作，百分之九工人受僱為技術員或同等工作，百分之二十六工人為技工，而絕大部份(百分之六十二)受僱為操作或非熟練工作。以此資料所反映出來的既成現實，香港政府於是設計一個教育政策，就是去供給那百分之三接受高等教育使之成為技師級人員，百分之九理工教育……這一種根據市場需要，而不是人的心智發展需要而訂定的教育政策，正是統治者最佳分而治之的統治方法，讓受教育的高低，將社會身份高下的劃分合理化。統治者所憂慮的正是：「無限制之擴展專上教育，很容易導致社會不滿現象。」

這個社會本應給予每一個人以機會去發揮他的才幹和興趣，而不是由一小撮政府官員官僚地決定誰可讀書，誰不能讀。任何類似的企圖，都只是一種強迫的「社會分工」而已。

這樣，三萬的私立大大專同學和其他連私立大專也沒有機會就讀的預科生，就被統治者所遺棄。高等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對於昂首以待當年的私立大專同學，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最直接的莫過於註冊私立大專地位一降再降，地位次於中大再降至低於理工，長遠一點的影響，就是綠皮書差不多默許了加學費，而政府對學生之貸款祇是彌補舊學費與新學費的差距，高昂的學費早已使私立大專的同學喘不過氣來，據浸會書院一次調查，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同學需要兼職以繳付學費，將來一旦加費成為事實，同學們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綠皮書強調「政府資助計劃，不會用作增加專上學院目前學生人數」；換言之，是不鼓勵增加私立大專學生人數，即使增加，政府也不加以援手，到頭來，吃苦頭的還是學生。

接受教育是每一個人應有權利，政府應該努力達至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擴大大學學位，而最現成和迅速，莫過於承認私立大專(註冊與未註冊)的地位，在師資和設備上大加資助(因為這些院校師資較低，不外是經費不足)。這些措施，對於每年有大量儲備金運往英國的香港政府而言，是力有所逮的。



來臨中的另一次衰退

一九七四至七五的那一場經濟危機，曾經造成二十多萬工人的失業。經七六年的經濟異常增長（工業出口總值升百分之四十三，比七五年增加十七點七億元，國民生產總額增百分之十六）之後，曾一度令統治階級以為經濟危機已一去不復。但事實上，這一次經濟的復甦是極之不平衡的。其中當然有些行業有大幅度的增長，（尤其是建築業），但對於佔本港工業生產半數以上的紡織染製業，情況却並非如此的。就以織布業為例吧：根據「經濟導報」出版的一九七七年「香港經濟年鑑」回顧七六年時說：「蓬勃一時的織布業（上半年開工率平均達八成），下半年產銷也漸趨呆滯。特別是生產牛仔布的工廠，全行業開工率平均只能維持在正常時期的六成左右；其中，大廠的開工率還可能達到七成，但小廠的開工率有些只得三成左右。大多數織布廠已從每天三班生產減為兩班，停開夜工，有些則在星期六及星期天全廠停工。」

進入七七年，紡織和製衣業的衰退就更為明顯。在最初九個月，成衣出口比去年同期減了百分之五點三，紡織品則減了百分之十六點四，共減少一億元，實際上已降回至七三年的水平。根據政府統計處在過份謹慎的統計中指出，這個衰退，已做成二萬八千五百個紡織和製衣工人失業，而根據其他專業刊物的估計，實際的數目應有三萬七千人。雖然，由於其他行業（特別是服務性行業——財務、金融、地產買賣等）仍然保持業務上升，將這些工人吸收進去，結果只是做成今年九月比去年九月多出約一萬一千名失業者。

不過這並非意味着紡織製衣業工人能夠長期地成功轉業，根據香港統計處發表的今年九月統計數字，連塑膠、電子和鐘錶業，工人就業額已經減少，下降回接近去年九月的水平；服務性行業吸收新人的速率亦已放慢，從六月至九月工人就業的數字看，就更可以看到失業增加的迅速程度；在這三個月內，工廠工人就減少了一萬七千五百個，同時間只增加了四千二百個服務性的工人。由此看來，雖然目前未能確定另一次衰退來臨的步伐的快慢，但到明年，恐怕衰退就極有可能更壞地顯露出來；那時佔香港工人中半數的紡織製衣工人，肯定就會首先面臨失業的威脅。其中，由於今次共市協議對棉紡影響最大，這行業的工人受打擊可能來得最快最大。

保護主義保護誰？

明顯地，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保護主義，首先打擊的是殖民地世界裏的工人階級。但殖民地資本家當然不會承擔因市場收縮而引起的利潤下降或賠本；一旦某一行業無錢可賺，則他們不是減低工資或提高物價，就是關廠裁員，將資金調往有利可圖的工業。做成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制度，但承擔危機的將是出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現代社會的科技生產力水平，本來是應做到物價越來越低，工人生活水平越高，勞動強度越小的。但私有制保護資本家的利潤，反而走向回頭路，使工人階級走向危機的深淵之中。

而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資本家，却大條道理地為保護主義政策辯護，他們斷言，保護主義可保衛這些國家內的工人的就業和生活。

這是一個謊言，正如我們下面要解釋到：關廠裁員，主要是由於資本家追求利潤，互相競爭去控制市場、致使利潤率下降，而保護主義其實是以前國家力量來控制市場的方法；故此，它不單不會製造出就業額，反而讓壟斷了市場的資本家能夠控制物價的偏高，從而削低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因此，工人階級絕不應支持資本家的保護主義政策。

保護主義只能引起兩個一般效果，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的失業，先進國內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對於目前的香港，西歐近期的保護主義又有更具體的意義。

藝美織造廠就是一個例子。當共市協定的影響還遠沒有顯露時（目前，因趕出口今年配額，很多大廠都開工達八成），資產階級已企圖利用來進行立即打擊工人階級的勾當，或者乘此來欺騙工人多作忍讓。敏感的「華僑日報」經濟版就鼓吹說：「

……乘這種「外侮」來刺激自我的團結與努力以和緩工人荒或工人熱誠下降的危機，可能反而是一種無形的好處……」如果用階級的術語，所謂「刺激自我團結」，就是要工人放棄自己的利益與資本家團結；「和緩工人荒」，就是以失業大軍來拉低工資；「和緩工人熱誠下降的危機」，就是要瓦解工人因階級利益與資本家所作的對抗。

港英資產階級中最自覺的份子，就是這樣鼓勵利用保護主義來向工人階級進攻的。

在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並不想將共市協議的影響全部結果讓群眾知道。麥里浩在十月初的「施政報告」中估計會使香港「損失」十億元。工商署副署長估計這只會有一萬八千五百人失業，但假如這個損失完全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那麼，據「文匯報」的計算，就至少有一萬八千人失業。

不過，情況不單如此，因為紡織業的衰退，遠在共市協議簽署之前就開始。事實上，香港紡織業所面臨最嚴重問題首先是缺乏訂單。今年共市給予香港的限額，相信只能使用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故問題不是限額過低，而是西歐市場被其他地區更廉價的產品所湧入，結果不是香港找不來訂單和有單亦無利可圖。所以，工業總會總幹事陳樹安比其他人更坦白地說：「長遠而言，紡織業的前景，不會有很大的發展……只要明年的情況可保留七六年的水平，已經值得安慰。」

當前，統治階級圍繞着「保護主義」的叫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煙幕，蓋着一個事實：無論有否保護主義，香港的紡織業因利潤率和競爭力的下降，已無可避免面臨一次求久性的收縮。他們害怕佔產業工人半數的紡織業工人知道這個真相，引起他們保衛自身就業權利的反抗。

弱肉強食

很多社會言論都指出，目前香港經濟發展面對的困難，主要是由於歐美經濟在七六年上半年有了回升之後，幾乎每一個工業先進國都重新陷入經濟生長放慢甚或衰退之中。對香港資產階級來說，這固然是指出了一個事實，但另一方面也是推卸責任的方法。不錯，西歐先進工業諸國，通貨膨脹仍然以兩位數字高升，失業人數一次又一次創造出新紀錄；到十月時，歐洲共同市場的九個國家的總失業人數已達六百萬，美國一國就有七百多萬。這種危機，致使資本主義世界公開承認未來的黯淡前景。例如，日本大財閥之一的住友商事會在六月中對七十五個國家進行過調查之後，發表了一份甚為「悲觀的」報告，宣稱：「世界經濟已陷入自三十年前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時代，勢將會繼續在黑暗中摸索。」

資本主義世界，經過戰後廿多年因「第三次工業革命」、改善生產機械（自動化、電腦化等）而經歷長期的相對性繁榮。但隨着生產機器的改良，生產力之抬高，生產出來的商品就越多，於是做成了市場的相對收縮，市場的競爭就越激烈；另一方面，生產機器之現代化，意味着越少倚靠勞動力，而人的勞動力是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人力之減少於商品生產中，亦即是說價格應越低。所以生產力越發展，就造成資本家投資越大（改良機器，購新設備），但相對的利潤（利潤率）却下降。

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時代裏，減低「利潤率」（即所謂「薄利多銷」），本來是資本家爭奪市場的方法。誰最財雄勢大，誰就能降低商品的價格，誰就能爭到買主、奪得市場；誰的資本越少，就倚靠勞動力來生產，除非通過對「廉價勞動力」的超額剝削，否則總是不能與大財團去競爭。於是「大魚吃小魚」，強國欺弱國的弱肉強食就成為資本主義「天然的」過程和法則，「自由競爭」變成了大財團的壟斷。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在本世紀初已經形成。當時，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對此過程作過深入的分析。列寧將此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稱為帝國主義；他在著名的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裏解釋道：「……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世界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的增加，隨着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繫和殖民地聯繫以及『勢力範圍』的盡力擴張，『自然』就使得這些壟斷同盟之間達成全世界的協定，形成國際卡特爾（大財團的一種）。」

「這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無比的階段。……」

「……資本家瓜分世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

香港雖然是一個殖民地，但壟斷的趨勢亦十分明顯。據統計，今年來已有千多家中小製衣廠結業或倒閉，另外有百多間布廠，四間紗廠結業。

以手槍來談判

「迫於無奈」的帝國主義者資本家要繼續控制和爭取市場，在經濟危機的時刻，最初便開始使用「雙邊協議」的方式，美總統卡達的國際貿易談判代表稱之為「恢復市場秩序的協議」。有人寄望這

能夠讓各國去平分春色，「共食一個蛋糕」。因為這種協議，一方面能讓國內受到威脅的產品能夠霸佔着國內市場，另一方面，由於這些「雙邊協議」是大家同意的，故此又可避免各國互相報復，造成不可遏止的世界性保護主義浪潮。

但是，正如列寧所解釋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早已超越過一國市場的疆界，各自闖進世界市場。資本家是不能自主地要走向全面世界貿易戰的道路的；為了要追求利潤，現在是「文質彬彬」地談判，將來會用戰爭來爭奪市場；這就是人類在廿世紀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現實上，那些「協議」大多數都不是雙方同意的，而是由單方強迫對立執行，否則它也不會被稱為保護主義。以香港最近簽署的共市紡織品協議為例，連署理布政司羅弼時事後也得說：「本港極其勉強及充滿疑慮地接受這個結果。協議內容若干條款是本港不願意接受的。」正確地說，香港是不得不接受，因為：「我們極可能面對共市不顧一切後果而向本港的產品施入口限制。」

假若如此，這對香港的資本家來說將是一個災難。較為明瞭局勢的資本家就會指出：「本港實行自動限制出口，比由進口國家實施入口管制為佳，本港應避免與共同市場談判破裂，以盡早達成協議。」作為殖民地資本家，他們理解到香港與其宗主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長期以來，他們為了追求利潤，將香港工業生產的發展，完全依從帝國主義的需要，壓低本港勞動工人的工資，生產一些在先進國製造就賺不到錢的產品，使到本港的經濟十分畸形地發展（例如紡織製衣業佔工業生產總值的一半）。這種依賴帝國主義的關係，根本就不容許本港資本家有獨立性；所以工商署長左敦在十一月十二日發出一份聲明中，指共市「要求香港作出犧牲」，又「歧視」香港。而儘管麥里浩在「聯邦作家協會」上概乎其論地批評：「無論是從數量看或其指導思想來看，與過去完全脫節」；而總商會執行董事麥理覺罵「現在的歐洲共同市場，很像已決定扮演一個專橫的紡織羅賓漢。」但他們完全是無能為力的。至於那個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篤修則天真地呼籲「英國政府負起責任」，實際上就更幻想了。赴共市談判的香港貿易處長苗禮善倒願意直接答覆：「英國在此一問題上，不會支持香港。」他們首先要照顧的是英國本身的紡織業，英國即使作為共市貿易部的主席，也改變不了「利」字當頭的現實。港督九月親自出馬到倫敦，也完全無濟於事。

工人階級必須自衛

統治階級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以及好歹也要提出一條出路，免群眾看到暗淡的前景。於是，它一方面提出要加速工業多元化，即主張不要再投資紡織製衣業，另一方面又要現有廠家把紡織品朝向高品質方面發展，好與法、美、日本等國競爭。這二種方法是不會帶來紡織業的好轉的。因為無論工業多元化，或者是發展高價貨，都祇會產生同一現象，就是資本更加集中，和紡織業的繼續走下坡。君不見已經倒閉的製衣廠，都是小型製衣廠嗎？這是因為要抽調資金，或者轉做高價貨，都非一些小廠所能為。其結果就是一下子甩掉了低價貨的工廠生產線，製造大量失業，並乘勢以失業來減低工資。

這樣，工業頭子的用意就很明顯了。他們已經下定决心，讓現有的紡織業收縮，讓它萎縮到某一程度。面臨如此重大的威脅和打擊，紡織及製衣工人將會失去任何生活保障。政府宣佈會造成一萬人失業。但實際上肯定會高於此數。一年間從紡織製衣轉入其他行業的，已達三萬多人，足見紡織業衰退。中、小廠就必然會造成更多無法轉業的人口。即使那些暫時仍然開足工的工友，也隨時有可能被壓低貨價、加強勞動強度。例如有些紡織廠，強迫工人一個人看二、三台機。祇有要求廠方保證最低收入，反對隔日開工，才能保障收入。當然資方是不會自動讓步的。相反，他們祇會設陷來解僱工人。

製衣業佔了紡織業的一半以上。因而在保障生活的奮鬥中，製衣工人就負擔了更首要的角色。如果製衣業工人節節敗退，整個紡織業就會受到影響。但是由於製衣業一貫施行「件工制」，往往造成工人間有一種競爭心理，而減少了工友的接觸的機會。因此製衣業工人在爭取合理要求之中，必須要慢慢克服這個障礙，把散漫的同行工人漸漸組織起來。沒有這個起碼條件，是談不上奮鬥的。

祇要工人的要求是正義的和合理的，就不怕資本家的打擊，更不怕沒有工會支持。工人的利益是共通的，步伐一致，就一定受到大多數工人的贊成。作為代表工人的紡織染工會和製衣工會，亦應及時行動起來，率先領導工人的團結。當資本家藉利潤下降而關廠、減薪、減工時和裁員時，工會和工人都可以提出：依照物價指數制定工資，並且將工時平分給工人而不削減工資。

金禧中學師生續抗爭



「金禧事件發展特刊」

（我們刊登下列的文章，基於對金禧中學師生的支持，雖然並不表示我們對文章內所有意見都同意。文章原刊於十一月四日出版的「金禧事件發展特刊」，乃由中文大學學生會時委會、中大學生報和港大學生會時委會出版。另一份由港大及中大五個團體出版的「金禧事件發展特刊」，亦於十二月中出版了。讀者們若取得該刊，可去函：香港西營盤薄扶林道香港大學學生會轉時委會收。

金禧中學事件，顯示出在學校內爭取思想、言論和行動自由的重要性。假如校方能夠以政治恐嚇（派派、革馬盟）來打擊同學，是由於它充份明白到可以利用群眾對政治的恐懼。故此，該項的教訓，不是逃避政治性的問題和害怕政治團體，而是為每一個人，不論其政治、宗教等思想，保衛其合理的權利。——編者）

六月罷課導源

寶血會金禧中學成立約四年餘，是由寶血會梁修女與一群有理想的青年教會工作者不斷運動，為培養出一批能吸收充分的學問、(一)提高品德、(二)關心社會、有勇氣去揭發及指出不義之舉的社會棟樑而努力耕耘；開辦初期，由於班數很少，加上老師的熱心教學，所以師生相處得融洽，此傳統一直保留至今，雖然教師已增至三十餘人，學生也達千人之眾，但金禧一向給人的印象是既活潑和融而又不能離離肅認真。

校方涉嫌濫用財力自創校以來便開始，初時老師以為學校創校需款急用，便不以為意；至於後來加入金禧的老師不時從學生週記上知道學校涉嫌濫用財力、書信、書籍而取利，發現今年初，兩位老師為了尋求真相，便開始搜集校方的財政資料，發現校方數年來涉嫌濫用財力達廿五萬之鉅，其中包括濫用行政人員薪金、濫用銷售文具書籍校徽和CAPITATION GRANT的誤用等，而所缺之財全數撥歸寶血會戶口。由於事態嚴重，此兩位老師一直秘密進行調查，為免影響金禧同學的學業，便於四月五日私下往見校長梁修女要求解釋，梁承認部份財政資料正確，但以校方需要還債為理由希望兩位老師諒察，兩位老師以財之舉是整個寶血會行為，不應單由梁修女負責，於是要求進見寶血會會長，不果。兩位老師感覺單憑自己力不能認清此事真相，遂將掌握的資料公諸全體教師，欲以全體教師之力進一步查詢校董會。四月十四日校董會接晤全體老師，透露梁修女因健康關係已向校董會請辭，而校長一職已由蕭麗芳修女暫代，並宣佈財政事件已請教育司署重核全盤賬目。於是校方便順利地把權奪學生、金禧員工的事實轉移到核對賬目問題上，和把責任推卸在梁修女個人身上了。

五月七日，當金禧學生在財政事件上還蒙在鼓裏之際，財政事件受害人——學生家長收到一份署名「一教師」的校方款項資料，當時全家長非常憤怒，要求校方公開解釋，而校方亦立刻作出反應，以教署調查未有結果作理由，拒絕教師、學生和學生家長作任何答覆。由於校方一直對財政的質詢採取緘默和推卸的策路，學生有感非責諸合群之力不辦，遂屢次以班或學生會名義上書代校長蕭修女，要求校方作交代，但蕭修女每次均以不同理由拒絕函件所提的要求。

一直以來，正如天主教大專聯會所言：「老師們是從人的層面去尋求解決。老師們所提出的要求清楚顯示出老師們只關心如何改進學校的教學，罪咎責任的問題尚屬次要。……可是，校方不斷逃避問題進一步打擊一己的威信。」六月三日，教師接獲校方續約聘書附同一「教職員服務約章」，內附十六項條文，包括「教員上課時，不得從事與教學無關工作」及第十四項的「本校教職員如有不遵守上列一至十三項任何一項之規定者，本校校董會有權給與適當之通知，予以解僱。」並且規定應聘人必須簽署此種束縛性條文無異對教師職位毫無保障，這是極之不尋常的做法，因為教署規定老師犯錯是先經書面警告而非適當通知便可解僱的。於是教師於六月六日去信校董會要求作字面解釋和修改。六月九日，即簽約限期的前一天，老師得到校董會的答覆是不接納修改服務約章的建議。

學生感覺校方一方面逃避財政責任問題，另一方面却對老師無理迫害，同學為怕大多數教師會自動辭職和為了進一步要求校方對財政責任表態，於是六月九日當天的第三次小息時相繼到操場，向校方提出三項要求：

- (一) 公開交代款項事件之始末。
- (二) 公開保證就款項事件老師所提出之三項要求。
- (三) 公開解釋就款項事件新訂守則內容。

但蕭代校長以「我職責乃維持學校紀綱，一切依從校董指示」為理由，堅持學生將要求用書面呈交，由於校方態度惡劣和強硬，於是同學繼續留在操場，而且坐了下來。而老師認為學生此次祇是要求他們應得的東西，故罷課至四時許（當時已非上課時間），有些老師自動坐下表示支持，亦有以半蹲半坐形式表示態度，至下午五時許因時間太晚的關係同學便接受勸諭返家，並草擬三項要求以書面呈交校方。

六月十日，校方仍然採「拖字訣」避而不答，學生乃作二度罷課，重提三項要求，並邀請老師代表公開校方款項始末，老師應承解釋，但要求學生在解釋完畢後，必須回課室上課，而學生表示接納。稍後，蕭校長陪同助理教育司林達濤及兩名高級教育官抵達金禧中學，蕭修女立刻中止老師代表說話，此時學生代表通過擴音器詢問全體同學要求誰說話，學生表示不要老師代表說話，於是老師代表繼續講解財政始末，然後同學亦遵守諾言返回課室上課，罷課至此終止。

由於此次中學罷課乃屬史無前例，教署對之極表關注，部份社會輿論亦肆意中傷，歪曲製造一個學生受政治唆使罷課的形象。而事實上，教師在整個罷課過程中站在被動的位置，甚至同學在罷課之前亦毫無心理準備，可是我們的教育司陶建生先生，在沒有半點證據和調查下，於六月十六日親筆致警告信全體教師，謂「近日汝等任教學校所發生的有關學生違抗學校當局事件，本人接獲報告，得悉汝等曾直接或間接介入其中，本人認為事態嚴重。……現向汝等警告，若再獲報告有相同行為，……教育司有權吊銷一位教師的註冊。」教署對教師吊銷註冊的恐嚇和校方十六條服務約章不是用意在明嗎？香港教育就是要製造一群祇會填鴨「內」讀物不會發問的學生，要是你的鸚鵡叫聲學得不好，你就得接受迫害，接受恐嚇。

暑假——迫害整頓期

金禧中學經過因財政問題而罷課的事件後，同學和老師因大考在即，亦先以學業為重，靜心等待教署的「調查」報告，而校方也利用大考與暑假這段緩衝時間，在各方面打點整頓，以轉移視線，最顯著是寶血會退出金禧中學，此後金禧改隸屬教署，以為財政事件便不了了之，並配合七月教署開放出的空氣謂財政根本沒有問題，而根源於會計計算錯誤賬目。

八月一日，政府委派新校長關慧賢代替蕭修女之職，關校長既非寶血會方人任，亦非修女，當時是聖伯多祿中學校長，自稱有廿多年行政經驗。上任不久，即大量招聘新教職員，據悉其中大部份受聘新職員為關校長之下學生及親友（如職員關小姐便是校長之姪女），縱非「自己人」，也必對應徵者說：「我請的老師要全為教徒，請你和我合作，如果你能和舊老師相處便相處吧，倘若難於相處，儘管和他們斷了，我早晚要他們另謀高就的。」同時增設副校長二人，分由來自培聖姓杜的和伍華姓羅的履任。

往年，上學年未結束時，老師便已知悉新學年任教的班級和擔任的科目，好使老師於暑假有充份時間準備課程，今年却延至九月一日即開課前天才知悉；與此同時，往年校方於開學後舉辦的教育方針研討會取消了（此當目的商討新學年的教育方針）。八月廿九日舉行的新生家長日也無須老師返校，席上，關校長向新同學說：「我是一家之主，你們能入學全是我決定的，你們要飲水思源啊，他們高年級是一個毒瘤，你們不要與舊同學來往，也不必尊敬舊老師。」關校長接着說：「難道他們叫你飲坑渠水你們也飲？如果你們聽我的說話，我會很愛惜你們的。」

綜觀整個暑假以來，金禧校方的部署，著着糾合私黨，擴大一己封建家族式的權力範圍，其對新教職員與新同學的行為如出一轍，在刻意離間老師間和同學間的關係，以遂其開學後迫害和孤立舊老師同學的私意。

校方一切功夫準備就緒後，便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上課後，校方不斷從事制度上的變更，主要有如下幾項：

- (一) 九月一日校方召開會議指定那一位教師教那一班那一科，而往年此等事項是在七月中旬決定的，而今年有些教師分擔到一些以前未接觸過的科目。另外，教育方針的闡釋則由某神父的六個演講所取代。
- (二) 舊老師全任教高年級，只有一兩個負責中一的科目，而中一級則由新老師擔任教席。
- (三) 老師權力削弱了，如缺席事項由教務處管理、貼海報由校長親自簽名批准，學生開班會須三日通知校方並填具申請書、校方接觸同學不須知會班主任（如校方發通知信給學生時先生絕不知情）、教師接見家長須有校長在場，又忙設級主任以監督教師等。
- (四) 往年的土風舞日、朗誦日、戲劇日均取消了，而隸屬於學生會的國樂組、羽毛球組等課外活動，在校方拖延下學生會未能重組，而遲遲不能活動；例如國樂組老師應同學要求便會二次提請關校長批准，得到的最後答覆却是國樂組能作為音樂科的課外活動，因此不能有國樂組或國樂會，同時每三個月要舉辦比賽一次。其他如針織班據稱也要明年年初時裝展覽才允許舉辦；總括來說，就只剩下運動日和一年一度的旅行。
- (五) 欲增設的校車服務，由於一年級申請人數不足廿人而告吹，而校方一直沒有詢問二年級以上的情况。
- (六) 聞說校方藉新職工之助時常巡迴偷聽老師和同學的談話，至於開會錄音、背後記名、映相等，更是四年來所沒有的。
- (七) 往年週會屬全校性質，現改為二組，分中一至中三一組和中三至中五一組，於不同時間舉行。
- (八) 學生今後須攜帶學生證返校，以便隨時查閱，缺帶者需受處分；據校方解釋是防止外人冒充學生。
- (九) 以往學生訂閱華僑日報和文匯報的設施取消了，此兩份報章為往年經濟及公共事務的課外讀物。

以上數項制度的變更，有的針對舊老師，有的針對舊同學，而然，這種種變更更不正與關校長開學禮說的「希望讓過去的算了，重新開始，我們應處事客觀，勿感情用事」的良言美意背道而馳嗎？

新舊教職員分析

如果一定要把新聘的教職員形象化的話，那麼某老師那句「我來金禧不是為教育而是為改造學生」最能具體落實他們的形象了。現在讓我們看看新聘教職員怎樣去「改造」金禧同學吧，以下是兩個典型例子。

(一) 一位新老師得意洋洋的「改造」同學時說：「學校好比一所百貨公司，先生祇不過是售貨員，學生則是顧客，新老板上任後如舊僱員忍受不了新老師的作風，大可竹竿地離去。」

(二) 一位新老師在初開學時對學生開宗明義表示有甚慶事都別麻煩她，所以對學生施以「倘有同學借東西不還，就學精一些，以後不要再借給她算了，這些小事不要來找我」的教育。

新老師的「改造」高論，相信很難在任一木教育理論和聖經中找到，至於金禧新聘的實驗室助理，更覺令人「刮目相看」，他對實驗一無所知，益且態度較市井之徒猶差，你想也不想不「哀鳴」，整日係度詐型「等句語會出自他的口來詛罵學生的，這位實驗室助理員還愛到處攝取學生談話和集會的鏡頭，據傳有

揭開關於以色列的神話

何虹



圖：以色列軍隊進攻一個巴勒斯坦村後做成的難民。

歐美各國和以色列的當政者一直都把中東戰爭危機的責任推在阿拉伯國家身上，宣傳以色列是猶太人長久慘被歧視後，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但阿拉伯各國却要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權利，要把這二百萬可憐的猶太人趕上絕路。

把猶太人過去和今天的被歧視，與以色列的存在連結起來是一種詭辯；因為要消除對猶太人的歧視是要爭取平等權利，但以色列則是一副進行對阿拉伯人歧視的帝國之國家機器。

以色列國的誕生

猶太復國主義原是猶太人中非常細小的流派。第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在完全得不到外界援手的情況下，被納粹大量屠殺，因而不少猶太人在對各國政府失望之餘，開始傾向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巴勒斯坦。

但要建立一個全是猶太人的國家，還要把當地的阿拉伯人驅逐或剝奪他們的民主權利，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必須借助歐美帝國主義的力量，朋比為奸。

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把巴勒斯坦分為阿拉伯國和猶太國，儘管這項決定為阿拉伯人所反對，當時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佔多數，在猶太國的範圍內也佔人口一半（五十萬），並擁有四分之三的可耕地。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歐美各國的政治和物質支持下，一方面排斥當地的阿拉伯人，進行建立其國家機構，另一方面則對阿拉伯人製造恐怖。一九四八年四月發生了一宗令人毛骨聳然的屠殺事件，阿拉伯人村落 DEIR Y-ASSIN 由於拒絕外國阿拉伯軍隊在當地設立據點，而受到鄰近猶太人的贊許，但卻受到猶太地下恐怖主義組織 IRGUN 攻擊。這還是在當地軍隊同意下行事的。結果有二百五十人被殺，其中一百五十多具屍體被掉下井裏。餘生者被押到耶路撒冷遊行^①。這宗淒厲的屠殺事件震驚了當地的阿拉伯人，既然與猶太人有關係的村落也會被屠殺，其他就更不言而喻，阿拉伯人的逃亡潮就此掀起了。

英國著名猶太復國主義者金芝（JOH KIMCHE）的著作「中末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也要承認這種恐怖：「IRGUN 洗劫阿拉伯家園和商店的行為很快就被解釋過去。來自 JAFFA 歷時四月的攻擊，使不少猶太人失去家園及其一切。為了提供他們的需要，其後成了這種行為的辯護。HAGANAH 和 PALMACH 這兩處的兵士不久就加入了這些大規模的洗劫和放肆的破壞，使猶太人的軍事勝利蒙上了一層黑幕，這種行為可能是自然的，但却是可憎的。這應該在一開始便堅決制止，但這種行為很快便有了物質的吸引、和辯護的藉口。」

一九四八年戰爭結束後，以色列的種族歧視制度也確立下來。稱之為制度是因為種族歧視行為的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一個猶太人希望與阿拉伯人平等共處也是不可能的事。而掠奪猶太人的土地的事件，也有了一個合法的名字：「歸還土地」。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以色列人權權同盟的主席，以色列·薩克教授（附註一）在一篇訪問記中，對以色列的種族歧視制

度作出了扼要的介紹^②。他說：「以色列事實上像南非那樣，存在種族隔離。…」

「例如，以色列統計處發表的一九七四年官方統計數字，出生，死亡數字等，你會看到以色列是沒有以色列人的，只有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如果你到任何一處新舊城并行的地方，如 NAZARETH 你會發覺舊城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任何人都可以來往，買賣，簽約租屋。但在新城，或稱上城，租樓則要證明是猶太人才可以。」這根據種族主義的定義，這就是要證明承租人的母親，或祖母，或曾祖母是猶太人。這些地區是猶太國家基金所興建或管理的。如果業主被發現租地方給非猶太人則會受到重罰。

「一個百分之九十的住宅區都需要這種手續的社會，除了名做隔離社會外，就沒有其他名字了。約翰尼斯堡也需要相似的證明，唯一的差異是人們知道約翰尼斯堡，而不知道 NAZARETH。」

「其他方面也是這樣。例如現在在以色列有一個稱為加尼里猶太化的官方計劃。這就是說政府認為加尼里有太多阿拉伯人，因而決定正式和公開地無償沒收他們一些土地，轉讓給猶太人，只准猶太人居住……」

在談及中小學教育方面，薩克教授指出：「在以色列有兩個完全分離的學校制度，希伯來語的和阿拉伯語的，在物質條件方面，阿拉伯學校系統受到嚴重的歧視，沒有獨立樓宇，或只有很差的，大多數缺乏實驗室，只有低水準的教師和助教。」

「最嚴重的歧視是在學習方面，阿拉伯學生要學習大量的希伯來文作品，包括希伯來文的宗教材料，聖經，猶太教法典，與及希伯來語及阿拉伯語的猶太復國主義著作，教可蘭經的時候只佔十分之一，而且還限於舊約部份。十七世紀後的阿拉伯作品是被禁制的。」

「舊作品的選錄也是集中於歌頌自然美的詩篇，所有會被詮譯為具有民族性的詩篇，即使是非常模糊，也被禁制。大部份歐洲著作和所有亞洲著作，如中國古代的著作，也被禁制。他們要學的是希伯來語。當然又要用希伯來語來應付考試，如果不及格不能升學。」

在存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大城市，「有時候，阿拉伯人被批准送子女到猶太學校，但不會到他們本區的學校，而是到其他地區，另一條村的學校，在一班裏，一百個猶太人中會有一個阿拉伯人。這是非常特准的了。」

在大學教育方面，「來自四個孩子的家庭的猶太學生，可以得到大幅度減費，但阿拉伯學生無論是來自十多個孩子的家庭也得不到任何減費……」

「阿拉伯學生的入學是受到限制的。有一些學系，如地理學和地質學，是不收阿拉伯人的。另一些只招收幾個，這是公開的。學生宿舍更沒有阿拉伯人的份兒。」

在城市撥款方面也是一樣。每一個猶太城市得到的政府撥款的每年每人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以色列鎊，阿拉伯城市則是七至十鎊，這又是公開和合法的。

在就業方面，「不存在合法的歧視，但很難有阿拉伯人得到好工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主要是做三種職業，第一、非技術農場工人；第二、非技術或半技術建築工人；第三、服務性的低薪工作，如洗碗等。……」

「在這個中東唯一有民主的地方，我們還有一九四九年的防衛條例（附註二），軍方能用以拘捕，囚禁，或限制任何以色列人的行動。但這些條例只用來對付阿拉伯人，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包括那些鼓吹恐怖主義的，會被放逐或未經審判監禁，但很多鼓吹與猶太人合作的阿拉伯人則受到如此待遇。」

六十年佔領區點滴

被以色列在一九六七戰爭佔領的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的情況就更多悲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掠奪，正以有計劃的形式在那裏重演。

一九六九年在 ROFD 有一千五百餘畝的土地被沒收。一九七二年一月，當地又有近一萬名農民和畜牧者被驅逐。他們的房舍、帳幕、穀麥被毀。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 AL JORR 部落的一千名成員被驅逐，三萬六千餘畝土地被收。到七六年中為止，以色列已在佔領區建立了六十八個殖民區^③。最近比堅政府還宣佈計劃在二十年內在西岸殖民二百萬，這些猶太人將要定居在政府事先劃定的「井」形的殖民網上，把當地的阿拉伯人分隔地一個一個的貧民窟^④。

那些被驅逐的阿拉伯人可能會在後來被送回原地方當殖民者的僱傭，使後者得到巨額利潤^⑤。

薩克教授的訪問記指出：「在佔領區的人民是完全沒有組織的權利的，一切委員會、政黨、組織、工會都被禁止。任何政治活動，甚至關於示威，也是禁止的。」

「在以色列，人們最少不會被放逐出境，他們會從一個城市放逐到一條村落，從一條村落放逐到另一條村落，但在佔領區，眾所周知，以色列民主的代表會在他們最喜愛的時間——零晨兩三點——造訪。他們可以只給那位父親半小時收拾行裝，帶他到約旦或黎巴嫩的邊境，放逐他離開家庭，禁止回來。可見，家庭復合只適用於蘇聯的猶太人，而不適用於巴勒斯坦。」此外，在佔領區，軍警暴力還遠較以色列嚴重。「在以色列出現毆打情況，也會是短促的，但據我所知，在佔領區的人民就慘受酷刑了。」

也不是猶太人的家園

對於以色列的大多數猶太勞動人民，猶太復國主義雖然維持了他們相對的特權，但也是他們備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出發點。左翼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往往在這方面提出批評。早在一九六九年美國的一份猶太復國主義刊物「以色列水平綫」有一篇文章寫道：「我是不能同意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如去年的情況）——銀行利潤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工業利潤高達百分之二十，但工人的薪水却維持不變，他們的薪金已凍結了多年。」

「我恐怕社會和經濟的鴻溝會日漸擴大。保安是需要的，但以此為理由，兼把金錢和生命的重擔強加在城鄉工人身上，但又不敢向上等階級要求強迫借款，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我深深不明政府把國有企業轉讓給私人公司和企業的第一步，他們甚至不迴避把股份轉讓給外國公司的念頭。」

直到今天，情況沒有轉好，而是更壞，擴大的非生產性的軍費支出和美元的下跌。導致以色列每年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四十。今年四月上台的比堅政府更開始了一連串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打擊，必需品的資助削減了百分之二十，對第一和第二孩子的家庭援助金被取消，公共部門開除了幾千名工人等等。

此外，以色列的二百萬猶太人也不是猶太民族的多數，在美國和歐洲就分別有五百萬猶太人。近年來，更越來越少猶太人移民以色列。蘇聯的猶太移民向來都是以色列新居民的來源，七五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蘇聯猶太移民不前往以色列，七六年則有百分之四十七。最近有大量猶太人離開阿根廷，其中百分之九十不願前往以色列^④。另一方面，則有大量的以色列猶太人離開以色列，七五年的人數是一萬五千左右。以色列美國領事館從晨早五時便出現人龍，有近百分之二十到美國旅遊的拒絕回國。七六年二月以色列的猶太人代辦處成立了防止移民出境部，開始限制猶太人本身自由選擇居留地的權利。

以色列國內的種族主義壓迫不斷地往外伸展，除了六七年進攻埃及等國外，其存在史還充滿了幫助帝國主義入侵中東的事蹟：

（第三版續）

十一月九日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第一位阿位伯國家元首到訪。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近三十年來的對立，是源於以色列蹂躪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制度，恰巧在薩達特宣佈願意走訪以色列之前數小時，以色列還以攻擊巴勒斯坦遊擊隊為藉口，轟炸黎巴嫩邊境村莊，造成一百名平民死亡，一百六十五名平民受傷。但薩達特漠視以色列的恐怖行動，其後在對以色列國會的致詞中宣稱：「中東問題有百分之七十是我們之間的心理隔膜，懷疑隔膜，排拒隔膜，……假想隔膜。」這些來自一位阿拉伯元首的行動和言詞，給與了以色列種族主義者無比的粉飾和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却由於表示反對薩達特此行，而被埃及政府封閉了設於開羅的電台，駐開羅辦事處人員被逐，在二十七日更有一名成員因派發反薩達特傳單而被捕。（開羅法新社二十七日電）

薩達特在以色列國會的致詞提出了他所謂持久、全面和平的五項條件，其中要點有：以色列撤出六七



何虹

薩達特訪以能帶來和平嗎？

一九七三年是怎樣的一年呢？

這一年，香港陷入了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生產退縮和大量工人失業的危機裏。

國際資本插手股票市場，輕波作浪，掠走了數十億港元。

政府的三高政策一意孤行，弄得情況惡化達到空前，有二十萬人失業、焦慮、徬徨、恐慌籠罩着社會。

「胎劫」便是以這一年作背景，透過影片中的女主角的生育問題，再現這一痛苦的歲月。

王葆真與鄭啓良分飾一對年輕夫婦，他們結婚六年，王葆真初次懷孕，感到欣慶，母親及同居的人也為此事而高興，正當此時，業主的加租信送來了，把他們這份喜悅的心情沖破，各人都為下個月的加租而憂慮。

然而，更大的憂慮還在後頭呢！因為社會經濟不景，他們夫婦兩人先後被解僱了。失業使生活起了變化，困難的日子不知何時才結束，一旦孩子出世，生活擔子便加重了。首先是鄭啓良產生打胎的念頭，王葆真極力反對。不久，她也對前景發生了懷疑，眼看着隔壁的理髮師太太生下第三個兒子沒有能力撫養，迫着送了給人，她害怕起來，決定去墮胎。「我們沒有能力養他，就不要生他。」這他是他們墮胎的理由。

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兒女，當王葆真看見很多窮人生活雖苦，依然努力的養活下一代，為甚麼自己就害怕這一點呢？在一陣猶疑之下，她最後放棄了墮胎的念頭。

不幸，為了應付生活，為了積蓄點錢留待孩子出生，她拼命工作，因而積勞成疾引致流產。

「我們結婚六年，從來沒有害過人，為甚麼我們沒有生孩子的權利？」這些話首先由王葆真說出，在影片結束時，這句話再由鄭啓良重覆一次。當鄭知道妻子流產後，導演以慢鏡頭拍攝他把剛買回來留給孩子玩的玩具，憤然摔碎，並歇斯底裏地高喊：「為甚麼我們沒有生孩子的權利」，隨即以凝鏡固定鄭的痠哀傷，結束影片。

誰都有生兒育女的權利，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特

年戰爭佔領區；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權益，包括建國權利；所有國家都有權在安全可靠的疆界內生存。

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薩達特的建議仿似近年來的美蘇及一些中東國家的統治層中流傳的，讓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現以色列佔領區之一）建國，這些所謂解決辦法的根本原因在於承認以色列的種族主義制度的合法地位，拒絕建立一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權利平等的國家。要建立這樣一個國家，就必須摧毀現存的以色列殖民國家，和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利。而不是將他們趕好約旦河西岸，另建一個「小巴勒斯坦國」。

這項建議之未能實現以及日內瓦和會不能重開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由於其種族主義本質使然，一直不肯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運動中各團體的聯合，並且不願放棄它在佔領區的經濟利益，自從高蘭高地、約旦河西岸和西奈半島於以色列在六七年戰爭中佔領以來，這些地區——主要是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約旦河西岸，提供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把以色列從經濟困難中拯救出來。以色列在逐步地把佔領區的經濟同化於以色列的經濟中。當地的農產品已從穀物和生果，轉為棉花、烟草等，以供應以色列工業需要。種植這些農產品需要更大量的人力，也要依賴以色列提供的肥料和機械。依靠以色列工廠的訂單生產的工廠和猶太人殖民區也不斷在佔領區湧現。縱使巴勒斯坦人能在約旦河西岸或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建國，在以色列有比較高的經濟水平和在資本主義的框框裏，這個巴勒斯坦國只會成為以色列的新殖民地，受以色列支配，而不會實現當地人民的全權。所謂持久和平也就不會出現。

在以色列方面，雖然薩達特的訪問給她這般榮耀，而薩達特在向埃及國家報告這項訪問時宣稱，「重開和談的障礙已消失了」，但却未見有來自以色列的任何明確讓步，貝京還是保持著一貫的「一切都可以談判的」含糊姿態。在巴勒斯坦的問題上如是，在領土問題上，外電流傳著各種樂觀的消息和猜度，為以色列製造和平形象，但貝京已重申：「薩達特總統知道在我們與鄰國的邊境問題上，我們有不同的立場。」可能貝京會願意在經濟利益最少的西奈半島方面讓步。

另一方面，薩達特的調子則有進一步的軟化。在到訪以色列時，薩達特強調地不準備與以色列單獨講和，而是謀求全面解決，但回到開羅後則宣佈邀請各有關方面，包括美國和蘇聯召開開羅會議作為日內瓦和談的預備會議後，薩達特開始提出以色列鄰國應個別與以色列簽訂雙邊條約，並且表示「如果只有以色列

到會，我一樣會召開開羅會議。」在大多數阿拉伯都在不同程度上對薩達特的做法保留或反對的情況下，所謂全面解決自然就會變為部份解決。以色列當然會願意與薩達特單獨妥協，因為這是削弱了薩達特自己與及約旦和敘利亞對與以色列的談判實力，孤立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從而加強了以色列的優勢。

這項已不是薩達特首次背叛巴勒斯坦解放事業。七六年中東爆發戰爭，薩達特擅自與以色列講和，他自上台以來的政策都是趨向與美帝打交道以博取經濟或軍事援助。因此，薩達特在七五年撕毀了蘇埃友好條約。但要取得帝國主義的睜眼，薩達特就非承認以色列不可，加上近來美國對埃及的軍事供應日減，而以色列的軍事壓力則日漸加強，世界經濟的不穩使薩達特更急於謀求外國投資，因而促成了薩達特的進一步背叛，這正好被以色列和美國利用來榨取更多讓步。

在這事件中，中國和蘇聯的工人國家的立場都違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蘇聯及敘利亞等國反對薩達特訪以，但其一貫立場是同意與以色列談判，謀求共存協訂的。因此，基本上是較為接近薩達特，而多於給予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解放。中國則超然於當前事變之上，只是一般地重申反猶太復國主義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運動。中共之迴避對薩達特訪以顯然是不想開罪這個反蘇領袖。這樣做使中共不能為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指出明確的現實方向。

據報導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的黎波里會議後達成了一致意見，反對與以色列和談，反對聯合國第二四二號和第三三八號決議。第二四二號決議把巴勒斯坦人民問題當作難民問題，而兩者都間接地承認以色列。這一新發展可以說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進步，因為，自一九七四年以來蘇聯和各中東國家的壓力，使以阿拉伯為有的部份巴勒斯坦民族組織軟化了對以色列的立場，同意在西岸建國，造成了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分裂。

在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分裂之前，各流派對解放運動的前途曾有過近似的見解，一九七一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力法塔赫（FATAH）的一位代表人沙真夫教授宣稱：「巴勒斯坦武裝反抗組織對未來巴勒斯坦的主要問題，助與猶太移民的關係問題，是基本上一致的。雖然大家有不同的思想和實踐。大家一般的構想是進步的、民主的、非宗教的。」「新國家將不會容許剝削、壓迫和種族主義隔離的出現……」這個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平等相處的社會是中東和平的唯一出路，它只有在推翻了以色列制度和資本主義後才能實現。

胎劫

恩傑

別在其經濟「定期性週期危機」的時候，個人的生活權利也難得到保障，生育確實增加了負擔，何況我們這個社會又沒有甚麼福利呢。想在那個年代，不是到處都發現有棄嬰嗎！

影片僅是接觸到當年經濟危機的表面的現象，並沒有深入指出形成這種危機的原因，對於工人被無理轉嫁困難，編導不僅沒有指出一條鬥爭的道路，對於工人在當年為了權益而作的鬥爭也有意逃避不談。

當鄭啓良失業後到處找工作，託朋友介紹職業，很幸運他得到朋友介紹在一個地盤工作。雖然他找到了工作，但總覺得不穩定，一旦大廈建成後，公司便會裁員。事實在那個年頭有不少大廈建成沒有人居住，不少空置的地盤都用作臨時停車場，建築業在當時來說有一蹶不振之勢。他有見及此，便決定騎牛搵馬，另找一份較為安定的工作。不過促使他另找別的行業的因素是因為地盤工作太危險。他眼看見一位工友失足摔倒受傷，他害怕起來，認為這仍工作實在太危險了。

不知多少生命的犧牲換來的是我們的居所，也填脹了資本家的肚袋。工人在工作時所遭遇到的危險應由誰人來負責，工作環境是否應該要改善一下，使危險減到最低最低呢？編導逃避了這些問題。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平日工人在資本家的殘酷的剝削下，只能過着艱苦的生活。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到來時，資本家不僅不對由他們一手造出來的災難負責，不但沒有保障工人的就業的權利，反而進一步削減工資，作合法的掠奪。當鄭啓良和王葆真被解僱，影片沒有鼓勵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與資方作鬥爭，用實際行動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片中的馮琳飾演鄭啓良的母親，她在一家酒樓工作，這家酒樓突然關閉，事前沒有半點跡象，她和其他工友的半個月薪金也被欺騙走了。馮琳回到家告訴家人和鄰居，她並聲言要跟資方理論。到此為止，影片再沒有繼續描寫馮琳的鬥爭過程。編導讓馮琳因為這件事而一氣之下病倒，追回欠薪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編導不讓她在病中仍然振作起來說：「只要我還有氣力，我便要去工作。」

在那個年頭找工作是那麽容易的嗎？編導鼓吹面對那資本主義的危機，只要腳踏實地的去幹，一切困難都會迎刃而解。這個論調，在七五年時的一套影片「萬戶千家」中玩過了。「萬戶千家」的結尾語說：「目前我們遭遇到經濟危機的困難，只要大家團結、忍耐，困難很快便會過去。」

甚麼階級說甚麼話，但從七五年的「萬戶千家」到七七年的「胎劫」却反映了作為目前工人階級最有勢力的左派（毛派）的墮落性，「萬戶千家」和「胎劫」都是此地被稱為「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暴露了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所扮演的軟弱角色。

回想七三年資本主義世界呈現一片蕭條的景象，經濟陷於恐慌狀態。由資產階級一手製造出來的社會災難轉嫁到勞苦大眾身上，藉口生意不景，普遍實行裁員。因此工潮頻頻發生。每次工潮發生，左派工會並不領導工人作爭取合理權益的鬥爭，反而在工人自發鬥爭時，總是滲入進行破壞、阻撓、犧牲工人，保護資本家。

記得，七四年九月的一天，兩名失業多時的青年在新蒲崗進行絕食，抗議政府對日益增多的失業問題採取莫不關心的態度，但以身為工人領導的毛派却表現得幸災樂禍，用托派攪事為藉口，間接鼓動港英政府對新蒲崗事件的鎮壓。他們已忘記了階級立場，站在資本家一方，借用反動勢力來鎮壓異己，他們願望就是不要鬥爭，他們樂於充任階級調和者。

十一月廿五日「香港商報」的「藝人影話」說：「這部戲的題材有點過時了……」有人說，香港居民很善忘，那年那月，看起來都好像很陌生的，不像切身的事，姑勿論如何，「胎劫」是香港的一段歷史，觀眾看電影是娛樂，不是研究歷史。反映了電影甚麼，他們也攪不清。不過這個歷史還未結束，它還繼續演下去。

七四年的經濟危機雖然表面是結束了，不要忘記，「定期性的重演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長期以來無法解決的難題，而且這種週期性的時間只有愈來愈短。新的經濟危機即將出現，放眼看毛派如何面對另一個新的經濟危機吧！

（我們在這裏刊登了陳碧蘭的文章：現代戀愛的批判，原刊於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婦女問題論文集」之內。

在最近數期的「新思潮」內，我們都刊登了一些文章和讀者來信，論及了有關婦女、婦女解放、家庭、性和戀愛方面的問題。這些文章發表後，我們「意外地」發覺，讀者對文章中的觀點和所提出的問題，引起了探討和辯論的興趣，反映了青年們對這個切身問題的關注。所以我們刊登了這篇文章，作進一步的探討；而且，我們還極之歡迎讀者們就這方面問題，來稿本刊討論和發表。

陳碧蘭，在一九二二年二十歲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就讀；次年，隨着中國二次大革命的爆發，她回國參加，迅即成爲華中地區婦女和學生運動的領袖。革命因蔣介石的血腥鎮壓而失敗後，陳和她的伴侶彭述之，因批評中共接受斯大林支持蔣介石及汪精衛的政策，致令革命悲慘地失敗，而被中共開除。彭和陳在一九二九年後，遂組織起中國的左派反對派（托派）。一九四八年托派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陳是政治局的成員。隨着中共奪取政權，陳和彭因反對它的官僚政策而不能留在國內；從此即過着流亡生活。目前，陳碧蘭正述着她的回憶錄。——（編者）

現代戀愛之批判

陳碧蘭

任你唱高調，任你將卑鄙的事實加以「美化」，或將粗淺的真理加以「玄化」，但事實終歸是事實，真理終歸是真理。譬如「戀愛」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人們不是將牠看作卑劣的行爲（如封建頭腦的道德家），便是將牠讚美成爲一種玄妙的無上神聖（如小布爾喬亞的智識份子），其實正確的說來，「戀愛」就是人類兩性本着生理上自然要求之一種表現，決不是甚麼卑劣的或無上神聖的行爲。

人類必由兩種動力來維持他的種族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這兩種動力一方面是種族的勞動生產；另一方面則是人類的兩性生殖。前者是人類用以維持其生存的手段；而後者則是人類用以繁衍他的種族的。沒有前者，則人類不能不發達他的社會生活，並且將因爲不生產足以滿足人類生活的一切需要品，便不能生存。即使能夠生存也只是動物的生存而不是人類的生存，根本就不能由動物演進爲人類。沒有後者，則人類歸於滅亡，不能繁衍其種族。生殖是生物保持其種族的唯一手段，人類雖然因爲他已經離開了動物，有了更高的進化，因而在他的生存上增加了一個勞動生產爲其維持生存的要素，但他同時並未減弱他的生殖之動物的本能，他仍然以兩性結合的性生殖爲其生存要素。所以兩性的結合不但是生物的本能，並且是生物之絕不可少的一種自保本能，雖不是直接保存其自身的自保本能，却是保存其種族延續的自保本能。因爲性的結合乃是生物的基本本能，是生物生存之自保的重要條件，所以在人類的一切慾望中，除了生存慾和食慾之外，性慾最爲強烈，凡是到了成年的人，便人人都有滿足這種要求的衝動。這種要求和衝動，也就同生存慾和食慾一樣，成爲人類的最主要最本能的本能之一。

性的衝動和要求，除掉這最本能的意義之外，還有兩種重要的作用，即一方爲精神上的調和發達所需要；他方面爲生理上的調和發達所需要。在前者不但是精神上的性的娛樂必須滿足，並且在性情的調和和學問事功的幫助，都能幫助對方的精神生活有優美的發展。在後者則因爲人類對於身體各部自然所規定的機能乃是需要平均發展的，我們非去平均滿足他不可。否則人類身體的組織將受傷害，且要阻礙生理的發達，因爲在生理的機能發育上，某一部份有了障礙，則他一部分非受影響不可。所以康德（KANT）說：「男女相結合成爲完全的人，一性去補充他性」。佛陀（BUDDHA）說：「性慾比用以馴服野性的鐵鉤，更爲尖銳，牠比火更熱，好像是能夠貫穿人類精神的箭」。我們從這兩位學者簡單的描寫中，就可以知道這種性慾的強度，對於兩性的器官或全身組織有重大的關係。

但這種性慾的強度，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樣，牠常能因社會的複雜關係而有不同的表現，這些複雜之中，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都有所「飽煖思淫慾」，這就很顯然的指出經濟關係對於性慾衝動的影響，那些居尊處優的男女，如果沒有一種教育和道德上的制裁，則必然衝動得要利害些，反之，在貧苦階級的男女，他因終日勞碌的結果，性的衝動必然要少些，這我們從從前的皇宮

貴族中的穢德污聞，與現代資本家的淫蕩放縱可以證明前者，從鄉村的一般農民之能自然的節制可以證明後者。他如社會的道德教育等等，無不能給予人類之性的衝動以這種影響。比如說，如教育得法，和避開猥褻的閑談，淫亂的書籍及強烈的酒類，很可以自行抑制，便是一例。又如婦女方面，一般的說來，其強度沒有男子那樣劇烈，而且有些婦人，因特殊的環境關係，或遭受了某種重大的刺激，對於「性」的問題往往發生厭惡和鄙視的心理。甚至抱獨身主義終身不嫁的也是很多的。但這種心理狀態和終身不嫁的事實，從生理的本質上出發的却是很少，乃是環境作用的結果。

我們從上面的事實看來，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說關於男女性的知識，非和其他知識同樣注重不可，人們都應該瞭解性器官機能與人身全部器官組織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所以「性慾」是人類本能的自然表現，決不是甚麼卑劣下流的行爲。人們應該以冷靜的頭腦，科學的眼光，去瞭解這個問題的本質和其變化。如果自己有精密的科學智識，則對於這個問題，便不至得到許多荒唐無稽的理論。

關於性的本能及其對於人身各部關係的重要，我們在前邊已經說過，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的來研究甚麼是戀愛的本質問題。我們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必須明瞭戀愛究竟是甚麼？我深信凡是一個健全的人，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齡和期間，都會發生「性」的衝動，而且都有必須滿足其要求和必要的。如果這種衝動是在一個健全的人的狀態之下發生的時候，便是一種自然的正當的要求，而決不是一般道德家所認爲是一種卑劣的行爲。因爲這種性的衝動不但在人類種族保存上是必要的，而且除由這主要的目的所激起的肉體的慾望，和感情的激動外，也有在心靈與人格和事業上互相幫助和完成的作用。所以普通一般健全的青年男女，對於異性的興味和追求，以及想與異性在一塊兒生活，共分苦樂，互相愛護，這是人類生理上的自然要求和表現，而且也是人類靈魂的深處發出來的一種自然之聲——是從人類更深的智慧之中所發出的一種自然之聲。這種生理與感情的相互狀態，我們可以說是「戀愛」。這種戀愛，我們應該認爲是人類一切美賦和欲求中之最珍貴的，人類應當無庸他，而不可加以無理的污蔑或視爲一種罪惡或墮落的觀念。

但我所說的這種戀愛，雖決不是純然肉體的，但也不是像一般詩人和文學家所歌頌讚美的純精神主義，理想主義的。我所主張不純然是肉體的理由，也並不是說說愛戀的男女青年們完全過着無性的關係的禁慾生活，而是說說完全憑性慾的衝動，不會產生真正的愛情，同時也不能使自己嘗到愛情的味道，自己不能感受愛情，或相信愛情，則再也不能在一個異性的身上喚起愛情來，甚至得到反感，這也不是真正的合理的戀愛。但同時如像那詩人文學家所歌頌讚美的純精神主義，或理想主義的戀愛，也要得到一個不好的結果。因爲如果將戀愛視爲一種無上神聖不可捉摸的東西，則他將集中他的全部靈魂和精力去追求這個理想主義的

戀愛，一天到晚，沈醉在這個昏迷的狀態之中，自己催眠自己，其結果不是弄得神經錯亂，便是自殺，這是非常之危險的！

在我們看來，戀愛問題，雖然主要的動機是從人類的生殖本能和種族自保本能中發生出來的，但人類並不是一般動物，他已有比一般動物進化得更高更複雜的生活，所以他的性的結合，就不單靠肉慾來滿足，不但美感和性情之投合是很重要的，而且一般的道德學問，思想等等，也很足以使愛情因而濃厚或淺薄。甚至私有社會裏的財產關係和社會地位等等，也能變成愛情的條件。最後這一點，雖然在私有社會的獨有變態，根本是不合理的，然而前幾點，實在不能不講求，如果這些不能互相滿足，便很足以妨礙愛情的鞏固和美滿。所以那些以肉體要求爲性的關係的唯一條件的，根本就不懂得人類怎樣不同於動物，人類怎樣在性的問題上也有別於動物。他們只懂得了人類的動物性，並沒有懂得人類之人類性，他們是戀愛問題中的機械觀和簡單主義者。反之，人類的戀愛既然仍以生殖和種族自保本能爲基礎，則肉體的要求實在佔了主要的地位，其他一切只能是這一要求中的附帶條件。如果除去肉體結合而談戀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爲我們愛別人的道德，學問，人格，性情等等，在非異性間也可以同樣愛上他這些優點，然而那始終只是友愛而不是戀愛。如果是兩性的愛，並且堪稱爲戀愛的，必然帶有性的關係和要求在其中，若說有不帶性的肉體關係而要求的戀愛，這完全是一種虛偽和鬼話。一般精神戀愛和理想主義的戀愛，他拋開物質基礎而談精神，這完全是唯心的。我們說，不但精神戀愛可以成立的說法，乃是在性的肉體要求上，未能得着滿足而自晦其目的的虛飾，並且我們也絕少看見戀愛場中真有永不得發生肉體關係而能永久維持其愛情的。這說明甚麼？這就是說，戀愛是以「性」的基礎爲主而以其條件爲副的原故。所以戀愛不但往往不能永保其無肉體關係的戀愛，並且能保持這種愛情，其中仍然有所謂肉體之愛的懸想以爲維繫，如若不然，則其愛必變質爲友誼的而非兩性的戀愛，這是許多事實告訴我們的，不能加以否認。

我們根據上述的理由，對於另一種最流行的通俗觀念，也得加以否認。因爲那些以爲熱情的戀愛是一件事，結婚又是一件事，這兩者不能合而爲一的，實際上這也是精神戀愛說之另一形式的表現。現代一般「浪漫詩克」的觀念，和那些戲劇和詩歌，電影和小說的因襲見解，都以爲「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都以爲情熱而動心，戰慄和狂喜的「青春之戀」的快樂，只有在結婚以前或通姦誘惑的過程之中才可以享受，在結婚以後平常了，甚至愛情也沒有，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我以為如果男女戀愛的結合不是盲目的純出於一時的性慾衝動，和金錢勢力的誘惑，也不是一個夢想家將牠看作一種無上神聖的東西，而是純然憑着男女兩性在長期的互相選擇，互相愛慕而於不知不覺之間雙方都發生了愛情，這種純由雙方愛情而結合的婚姻，並不是結了婚就沒有熱烈的戀愛，而且是保持這種戀愛使其永續不滅。只有如此，才能鞏固這一戀愛，而真正鞏固的戀愛，也要從性的結合之結婚中才產生得出來的。

說到這裏，則怎樣才是真正的合理的戀愛問題便發生了。我們如果嚴格地說來，男女兩性的真實戀愛，除了性的關係之外，是應該純粹以男女雙方的愛情爲基礎，其次如志趣和個性的相投，嗜好藝術的同等……等等，也都是達到愛情圓滿的附帶條件。但這種戀愛的結合，在現代這種市儈的私有財產制的社會組織狀況之下，不僅是很少數，而且也很可能！因爲現在的社會是以產業上的榨取，少數特權階級對於生產手段並天然資源獨占爲基礎的社會，這種特權階級對於沉溺於性慾無限的權力，而給與女性的，只是服從男性，而忽視了性的互相作用。所以在這種社會制度裏的女性，是陷於階級和性的兩重壓迫之下，其結果性的選擇日益失其自然作用，甚高尚的愛情，真正的戀愛，早已金錢化了，早已在利益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因爲現在的社會，處處爲金錢支配着，一切的文明，是金錢的文明，一切問題，

都是金錢爲標準，所以性的關係的決定亦在金錢，而不在戀愛，只要你有錢，便誰都可以討老婆，只要你有錢，六七十歲的老頭子還可以討十六七歲的少女作老婆，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在女子方面，大多數的女子，都是將結婚當作「找養院」，一結了婚，生活的擔子就完全負在男子身上，而在男子方面，也認爲這是他自已不該避的責任。而且男子要娶一個所謂上層社會的女子結婚，非等到自己積有充分的財產以滿足其所希望的女子不可。他所以傾慕那女子，也是爲了金錢的聲望，和金錢所培養出來的品格與美貌。這種結婚，往往在結婚以後，因經濟條件的變化，或遇着某種意外的遭遇，使得家庭經濟破產的時候，那女子就會不滿意起來，甚至完全不愛她的丈夫了。反之，也有這樣的事實，就是男子對於他的妻子爲家庭的事務弄得身心俱疲，且不斷的生育子女，對於男子已失却迷力，那男子就向外邊尋找滿足其娛樂的對象，或去奪取別人的家庭幸福。這些現象，我們如果仔細的追溯一下，可以說都是現社會組織之下不可避免的結果。

社會進一步的進化發展，生產方法愈趨進步，生產愈集中於少數人獨占的時候，則金錢的觀念愈在人們的腦筋中固定起來，結婚漸漸減少愛情的成分，而只成爲財產的問題了。現在歐洲諸國，在貧民之間，尚有戀愛結婚的事實存在，愈到上層階級，則結婚的條件，就愈爲金錢勢力所支配，完全依其財產多寡而定，說不上有甚麼愛情，即有，其程度亦極其稀薄。所以在這種社會的戀愛，只是虛榮和物質投機的對象，純粹的戀愛，是很少見的。那些漂亮的小姐們，她們以爲對於一個男子的戀愛，在她自己看來是一種純真的熱烈的愛，而實際上如果露骨說來，只是金錢的社會地位的戀愛，鑽石，衣袋，胭脂粉粉的戀愛愛說來，倍倍說：「……金錢結婚是達到高等社會生活最安全而容易的手段，一方面爲着愈多愈好的金錢慾望，他方面爲着地位，稱號，身分的權權，在上層社會階級中，以這種方法，互相爭奪，對手的權權，在婚姻作交易，這是一種因習的結合，兩個人表示互相尊敬，骨子裏却個人有個人的主意」（見婦人與社會一五九頁）。這一段話，完全將這種社會裏的男女關係描寫得十分透徹了。

以上所說，是偏於上層社會的，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下層社會的男女關係是怎樣。在下層社會裏的男女結合，多半出於自然的自然要求，而金錢和虛榮的成分却很少。但是，使婚姻發生障礙的原因：一方面因爲窮苦太甚，養育子女過多，疾病和死亡，是常有的事；他方面僱主的裁員減薪，新的機械的發明和生產日益趨於合理化，將成千成萬的工人逐出工廠，以致失業的劇增，常常跟隨着他們。再加以戰爭和對他們不利的苛捐雜稅的剝削，更使他們的生活日趨於困難，這些現象，首先就從每個下層社會的家庭中表現出來，每日每時，都有必需的物質要求，始終不能得到滿足，於是夫婦間的不和，相互的爭吵之事常常發生，家庭也就因此而趨於破裂。

如果夫婦是工人，同時又有許多小孩的時候，則他們的生活苦況，更可想見。一天作到十個鐘頭或十二個鐘頭以上的工作（中國現在仍是十二個鐘頭以上），且因工廠離家頭太遠和休息時間太少的原因，中飽多半是不回家的，所以從早進廠直到晚歸跑回家，已經是精疲力竭，再加上那狹小的居室，潮濕和黑暗，心裏得不到一點愉快之感，疲憊得如老馬一般的妻子，跑到家來，還要燒飯洗衣，甚至到深夜還要縫補補襪，夫婦之間，連連端需要的談話和安慰都一點也沒有。丈夫也沒有知識，妻子更不待說是沒有，所以夫婦之間沒有多少話，於是丈夫就跑到茶樓酒店，去尋找家庭裏所沒有的快樂，或者飲酒，或耽於賭博。妻子呢，一個人坐在家裏，一邊憂鬱得快要死，還像牛馬一般的做家庭所必要的工作，一點休息也沒有，等到丈夫回到家來，總不免一場吵鬧，於是漸漸釀成家庭的破裂，夫妻的感情也就因此而趨於破裂。

其次，還有成千成萬的窮苦羣衆和貧民，他們因爲沒有錢，多半是沒有妻子的，所以他們只有宿娼留妓，傳染一身花柳梅毒，有的因此而殘廢，甚至因此而死亡的亦不知凡幾。至於那無數萬的窮苦女工和鄉村的貧苦少女，他因生活的壓迫而流爲娼妓，那些妓女中，除了少數爲愛好虛榮和華裝麗服之外，多半是因生活的壓迫所致。

總結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追根究底的追溯起來，都不外是經濟制度的不良和社會不平等所致。所以人類要使人人得到真正圓滿的戀愛，必先人人都有豐衣足食才有可能。怎樣能使人人都有豐衣足食，使人人都有生活都趨於平等，先決的條件，就是我們必須先從改造社會入手，重新建設一個和平的自由平等的社會，在這種新社會裏，誰也不受誰的支配和壓迫。特別婦女在這個社會裏，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完全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對於愛人的選擇，婦女也和男子一樣毫無拘束，除了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之外，不受任何牽制，不受任何的干涉。

總之，在新的社會裏，人類對於性的問題，只要在不妨害他人的條件之下，完全由自己的意志自由來處理。對於社會的男子，因爲新社會教育和社會組織的結果，男女兩性的性的問題，一切假道學及神秘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自然消滅，一切資產和妨礙結婚生活的許多障礙，可以徹底掃除，那時男女兩性的關係，將更自然而美滿。